



中国书史

我国纸写书的起源和它的发展

张文玲

我们的祖先最早发明了纸。纸，作为文字载体，它优越于笨重的竹木简牍和昂贵的缣帛，是一种理想的书写材料，适宜人类文化的储存、传播和发展。因此，纸的诞生和随着造纸技术的发展，在书籍发展史上引起了一次重大的变革，这就是纸本书逐步替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。当然，古代对一种发明创造和新技术的认识和应用，与之今天相比要缓慢得多。这种纸本书替代竹、帛书的过程也是逐步实现的。

纸的发明和最初的纸写书

纸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？

蔡伦以前是否已出现植物纤维纸呢？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，可以回答这方面的问题。

1933年，已故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地下，首先掘到一片植物纤维的古纸，据考证它至少应是公元前49年以前的纸，比“蔡侯纸”要早150年。可惜这片古纸毁于战火，所幸有此纸的照片和一段描述它的文字存世。

1957年5月，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灞桥的一座西汉古墓中，发现一叠古纸残片。经鉴定这些古纸至少不晚于西汉武帝刘彻（前

140—前87年)在位时代。后被命名为“灞桥纸”。

1973年,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的肩水金关故地(今嘉峪关东北),发现两片西汉麻纸,断代在公元前一世纪,被命名为“金关纸”。

1978年,在陕西扶风县(汉代首都长安的西北)的中颜村发现了公元前73—前49年间的西汉麻纸,被命名为“中颜纸”。

总而言之,从目前考古发现的四批西汉时代的植物纤维纸,说明我们的祖先在西汉时就发明了植物纤维纸,纸的发明权不一定是蔡伦。

纸出现后,什么时候用纸写字、写书便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。

文献最早记载纸写书的是公元二世纪应劭的《风俗通义》:汉光武帝刘秀,在公元25年从长安迁都洛阳,“载素、简、纸经凡二千辆”。此处把素(帛书)、简(竹木简书)、纸经并列,足见“纸经”应该是纸写经书。与应劭同时代的刘珍等撰的《东观汉纪·贾逵传》曰:公元76年汉章帝命博士贾逵(29—101)给学生讲《春秋左传》,曾赐予用竹简及纸写经传各一部。晋人袁宏《后汉纪·和帝纪》载:邓贵妃于公元102年即皇后位后,命各地每年上贡纸、墨,以供书写之用。以上记载,说明在公元25年、76年、102年都有以纸写字、写书的事。这告诉我们至少在东汉初期、蔡伦以前已开始用纸作材料写字、写书了。

对此,近代出土文物亦可寻得佐证。在甘肃居延出土的汉代木简中,发现有“官写氏”的字样。据汉学家陈直考证,“氏即纸字省文”。还有的木简写有“五十一纸五斤”、“二纸自取”等字。居延木简属于西汉中晚期(前一世纪),故此简文字是有关书写纸的最早记载。

1942年,考古学家劳榘在甘肃居延古烽燧遗址发掘出有字麻纸。这是一页用汉隶字体写的书信的残页。1975年劳榘谈到此纸

年代时说，公元78年是该纸最晚的下限，“再晚的可能性不多，而较早的可能性还存在着。”（见潘吉星《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看造纸术的起源》）劳榘认为此字纸上限可以溯至公元前一世纪。此字纸现存台湾。这件出土物十分珍贵，它的重大意义在于这是我国、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字纸实物，其年代在蔡伦献纸以前。

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证明，至少在西汉末、东汉初，我们的祖先已开始用纸作为书写材料，记载事物和知识。在书籍形制的演变史上，它揭开了纸本书的序幕，开后世纸写书之滥觞。

当然，这个时期纸业初创，不仅产量很少，而且质量粗劣，因此当时的书写材料之大宗仍是竹木、缣帛。西汉自武帝“广开献书之路，百年之间，书积如丘山。故外有太常、太史、博士之藏，内有延阁、广内、秘室之府”（《太平御览》卷233）。到了西汉末年成帝时，刘向、刘歆父子在皇家图书馆校仇天下存书二十余年，共校图书一万三千二百十九卷。他们所校阅底本和缮写之书是什么样子的书呢？刘向的《叙录》，每篇多是先说：“皆已定，以杀青书，可缮写。”应劭在他的《风俗通》里解释说：“杀青书，可缮写。盖案刘向《别录》曰：‘杀青者，直用青竹简书耳’。”（《初学记》卷28）《文选》张景阳“杂诗”李善注曰：“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，皆先书竹，为易刊定，可缮写者以上素也。今东观书，竹素也。”从刘向的《叙录》原文和应劭、李善的解释，可以说无论刘向等人校仇的汉代所存大批的各类书籍，或缮写的清本，主要还是竹木简书，也杂用一些缣帛，至于是否有纸本书，或以纸为底缮写清本，都没有史料记载。

竹木、帛、纸并用时期

东汉造纸业由少府属官尚方令主管。和帝时蔡伦作尚方令，监制过造纸业。他扩大造纸原料，首先使用了以树皮（木本韧皮

纤维)等原料造纸,同时改进造纸技术,因此造出了优良的“蔡侯纸”。至汉末,造纸技术更有提高,还出现了名纸,“左伯纸”就是其中之一。唐张怀瓘《书断》曰:“左伯,字子邑,东莱人,……擅名汉末,又甚能造纸。”汉末赵岐《三辅决录》引韦诞(179—253)奏言:“夫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用张芝笔、左伯纸及臣墨,皆古法。兼此三具,又得臣手,然后可以尽径丈之势,方寸千言。”

造纸技术的改进和发展以及名笔佳墨的出现,这为以纸为书写材料提供了物质基础。纸的价格低廉,质地轻软,易于书写的性能也日益得到体验。从东汉蔡伦时代到东晋,是我国竹木简书、帛书、纸写书同时并用的时期。

东汉用纸写字的记载,史不绝书。前引邓皇后命各地每年上贡纸墨,是为东汉初供给宫内纸、墨以书写的记载。《后汉书·和帝纪》曰:“永元十四年(102年)冬十月辛卯,立皇后邓氏,……诸家岁供纸墨通殷勤而已。”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载:少府守宫令“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”;尚书令右丞“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”。这段文字记载了宫廷内有专门掌管纸笔墨的官吏。

《北堂书钞》卷104,引《马融与窦伯可书》曰:“孟陵来赐书,见手书欢喜何量,书虽两纸八行,行七字。”又同卷引《崔瑗与葛元甫书》曰:“并送《许子》十卷,贫不及素,但以纸耳。”又引《延笃(167年卒)答张奐书》曰:“惟别三年,梦想忆念,何月有违,伯英(张芝)来惠书四纸,读之反复,喜不可言。”《后汉书·延笃传》注引《先贤行状》曰:“笃欲写《左氏传》,无纸。(其师)唐溪典以废笺记与之,笃以笺记纸不可写,乃借本诵之。”这些文献记述了当时用纸写信、写书的情况。

近现代考古工作者也不断发现东汉的字纸。除前述劳榦在甘肃居延烽燧遗址发现的字纸外,1901年在新疆出土正背两面写有

文字的纸；斯坦因《东土耳其斯坦因发现的中文文书》曰：“在敦煌找到三张汉代纸写的残卷，留下几个字，似乎是书信的样子，可以断定是公元后二世纪写成的”（原文见《敦煌汉简校文》页116）；1974年在甘肃武威县旱滩坡发现东汉晚期的上有较大汉隶墨迹的字纸。

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，都说明东汉时代纸已被用来写字、著书。但反过来看，不仅关于汉代纸写书的文献记载极少、简略，而且其出土物也是罕见的。这说明当时纸作为新型材料刚刚崛起，没有普遍应用，其主要材料还是竹木和缣帛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，一是东汉的造纸业尽管有了发展，但生产能力还是很低的，在纸的质量上有待于进一步提高，在纸的产量上还不可能较大满足书写的需要。二是官府和民间长时间以来多用竹、帛为书写材料，这种习惯势力的改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，而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。尤其东汉以后，社会风尚日趋浮夸，门第、等级、贫富在人们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，这种腐朽思想在对待纸的使用上也表现出来，从而影响了纸的使用和推广。如《崔瑗与葛元甫书》曰：“今送《许子》十卷，贫不及素，但以纸耳。”这里把用纸写的书，看成是贫穷而为之。再如魏文帝曹丕，“素书所著《典论》及诗赋给孙权；又以纸写一通（部）与张昭。”这里的帛写书、纸写书更成为区别官职和权势大小的尺度了。

三国以后，特别是到了晋代，纸写书有了大的改变。首先在于晋以后的纸在质量上有了新的提高，这表现在纸的白度增加，表面较平滑，结构较紧凑，纤维束较少，质地细薄坚实，易于书写。人们从实际中体验到纸的优越性，日益喜欢用纸，对于昂贵的缣帛和笨拙的简牍日趋淡薄而少用了。有的文人还以纸为题材，写诗作赋，对纸大加歌颂。如晋代傅咸《纸赋》曰：“夫其为物（纸），厥美可珍。廉方有则，体洁性真。含章蕴藻，实好斯文。取彼之弊，以为己新。揽之则舒，舍之则卷。可屈可伸，能幽能显。”这

些美辞佳语表达了作者对纸的喜爱感情。

在晋代，纸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，缣帛、简牍如江河日下，使用的愈来愈少。由于纸的推广普及，有力地促进了书籍文献资料和科学文化的传播。反过来说，科学文化和图书事业的发展，又需要造出更多的纸，从而推动了造纸技术的发展。《初学记》卷21引晋人虞预《请秘府纸表》曰：“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，不任所给。遇欲请四百枚，付著作史，书写起居注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605引《语林》曰：“王右军（王羲之）为会稽谢公乞笺纸，库中唯有九万枚，悉与之。”从这些记载中，可以想见当时纸的数量之大。用纸数量之大必然引起藏书之富。三国魏时官府藏书只有四千五百六十二卷，西晋初年官府藏书达到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，到了东晋孝武帝时，已有三万六千卷之多！与此同时，私人藏书也逐渐多起来。著述的增加引起了抄书之风盛行，这时已有专门从事抄书职业的人和机构。他们除用纸抄录经传史籍杂著歌赋外，还用纸书写日常公私文件。由于当时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，因之还有人专抄佛道经卷。

十九世纪初，在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二万五千余卷遗书，绝大部分为纸写卷子，最早的有手抄于晋代的。有一件《陀罗尼神咒经》，为西晋咸宁四年（278年）七月十日之经跋。这是现存年代最早的经书之一，可惜已流失国外。解放前在我国西北、特别是新疆地区曾发掘出不少纸写文书、经卷的残页，其中有晋代的。如发现于新疆鄯善吐峪沟之西晋元康六年（296年）书写的《诸佛要集经》，发现于新疆楼兰遗址的晋代手抄《战国策》残页（以上两件现存日本），都是年代久远的现存纸写实物。另外，斯坦因在我国敦煌附近长城烽燧遗址中，曾发现九封纸写的粟特文书信，斯坦因把它断为二世纪中叶的遗物，后经考释，确认为西晋永嘉年间，即公元312至313年前后的书信。查国内所收藏的早期纸本文书，有后秦白雀元年（384年）衣物疏，哈拉合卓出土；有后凉

麟嘉五年（393年）王相高写的《维摩经》；北凉神玺三年（399年）《贤劫千佛品经》；西凉建初十二年（417年）写本《律藏初分》等。后三件均出于敦煌石室。解放后，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甘肃、新疆等地区发掘出数以千计的纸写文书、经卷中，其中最早为西晋泰始九年（273年）的。另外，前凉建兴三十六年（348年）的书信残页、前凉升平十一年（367年）王念卖驼契等，也是早期的纸写书信、文书。

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晋代人手抄的《三国志》（残卷）。据《艺文类聚》卷58曰：“王隐《晋书》曰：陈寿卒，诏下河南，遣吏赍纸笔，就寿门下，写取国志。”从这条记载看，连当时皇帝都曾下诏书，令抄写陈寿《三国志》，那么，在民间竞相传抄《三国志》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。而今天，我们的确从地下又掘得了晋代人抄写的两件《三国志》。一件是1942年在新疆鄯善县出土，是《吴书·虞翻传》、《吴书·张温传》的部分内容，计八十行，一千零九十余字，中有残损。这件残卷的原本流入日本，国内幸有影印本流传；另一件是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县的英沙古城附近的一座佛塔遗址中发现，是《吴书·吴主权传》和《魏书·臧洪传》的残卷，存四十行，五百七十余字，中有残缺。两种抄本，均隶书体，行款恭正，但非一人抄写。就字迹看，后者当比前者较早，可能为西晋抄写，前者可能为东晋抄写。这两个手抄《三国志》残卷，离陈寿撰写是书的年代相去不远，可以说是《三国志》最早的版本。又由于从字数和行数都超过现发现的与之年代相当的其它文书、经卷的残页，而且是正史的手抄本，所以更增加了它的史料价值，实为书史研究重要的实物资料。晋抄《三国志》应被视为极珍贵的文物之宝。

晋代用纸抄书的盛行，还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。可想而知，在一片宽一厘米左右坚硬的简牍上写字，毛笔的笔锋受书写材料空间和质地的限制，是不能充分施展技艺的。如果改在洁白

平滑而又柔软受墨的大纸上挥毫，情况就会根本改观。追溯到东汉时代，我国有书法家蔡邕（132—192），他书法精妙，尤工隶书，并始创“飞白”书，影响甚大。晋代王羲之（321—379，一作303—361）、王献之（344—386）的书法艺术蜚声古今，名冠天下。他们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纸的普遍应用，使之能够展纸挥毫，随心所欲地进行练习而成名手。王羲之所书《兰亭序》，是名闻遐迩的书法艺术的佳品，它的真迹在唐代失传了，但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摹本。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是西晋书法家陆机（261—303）的《平复帖》，帖的墨迹是用秃笔写的草书（草隶），笔意刚劲古朴。这件法帖要比《兰亭序》早写一百多年，被称为“法帖之祖”，又被誉为“晋初开山第一祖墨”。

晋代的绘画艺术也有用纸为底涂抹的。1964年在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的一座晋代墓中，发现一幅彩绘纸画。这幅画长106·5厘米，高47厘米，由六张纸粘联在一起，画着墓主人生前呼奴使婢的傲慢神态。由于晋以前以纸为底的绘画未见实物，这件出自民间画工之手的、被命名为晋代“地主生活图”的作品，是现存最早的纸绘画。

总之，从东汉至晋代，是纸、竹木、缣帛并用时期。这种“并用”不是均衡分配，而是竹木、缣帛由主要书写材料逐渐降为次要的、稀用的材料；纸由最初的少量使用逐渐发展到大量的使用。不仅被用来抄写经传、史籍、诗赋、杂著等各类著述，而且被用来抄写佛道经卷、官府文书、帐簿、私人书信，同时还是书法、绘画等的最好材料。这时候，纸已成为占据主要地位的书写材料了。

用纸替代竹木、缣帛

东晋末年，豪族桓玄（369—404）掌握朝政大权后，于东晋元兴三年（404年）下令：“古无纸，故用简，非主于敬也。今诸

用简者，皆以黄纸代之。”（《初学记》卷11引《桓公伪事》）这是统治者第一次明令规定停止简牍而代之以纸的记载。一般说来，公元404年可以作为以纸代简的一个年代界限。从地下出土物也表明灭晋以后不再出现简牍文书，而全是纸写材料了。

晋亡后，形成南北朝对峙的局面。这个时期秘书省在沿袭东汉旧制设管理藏书专职人员“令史”以外，又设立了正字和弟子。弟子是写书人员，弟子写完之后，由正字进行核对。另外，古书中也有关于以纸抄书的记载。如南朝梁萧子显《齐书》曰：“隐士沈麟士（遭）火，烧书数千卷。麟士年过八十，耳目犹聪明，乃手写细书，复成二、三千卷，满数十篋。”手抄二、三千卷，这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。《后魏书》载穆子容“求天下书，逢即写录，所得万余卷”。《梁书》载袁峻“家贫无书，从假借必皆抄写自课，日五十纸，纸数不登则不止”。这些材料反映出当时以纸抄书的情况。

由于抄书风气的盛行，当时代人抄书已形成一种专门的职业，这种抄书的人叫做“经生”。写书、卖书也成为一些贫穷文士的生活出路。售卖书籍的书肆，起源于汉代，这时也更加发展了。

国家藏书、私人藏书都得到较大发展。反映隋以前的国家藏书情况，可以从《隋书·经籍志》窥见一个轮廓。《经籍志》是对隋以前图书的一次大整理。它正式使用经、史、子、集类名和分类细目，这反映中国古籍发展到一个分类完备而又日趋科学的地步；它依据隋、唐初时国家藏书、并参考有关书目而编成，包括了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五代官、私书目所载的现存图书。共收书（包括已亡）六千五百十八部，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。这个总卷数比之西晋时增加近一倍。南北朝是个战火迭起、社会大动荡、大分裂的时代，图书还有了这样的发展，纸的普遍使用应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。

从文物看，敦煌石窟遗物，凡这个时期的都是一字字用笔手

抄在纸上的。写本以佛经居多，还有迄今稀见的各类书的写本和公私文书、契约等。还有许多用我国境内古代兄弟民族文字（古维吾尔文、藏文、西夏文、于阗文、龟兹文）和中亚、西亚、南亚以及欧洲文字（吐火罗文、粟特文、波斯文、古叙利亚文、波罗密文、梵文和希腊文等）书写的书卷和文书。而新疆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文书纸，有相当数量是十六国时代的。这些文书经过整理，有契约（包括租佃、买卖、雇佣、借贷等）、籍帐（手实、计帐、户籍、受田帐、欠田帐、退田帐、差科簿、定户等）、官府文书（符帖牒状、审理案件的辩辞和录案、授官授勋的告身、行旅过所和公验、收发文簿、收支帐历等）、私人信札、经籍写本、随葬衣服疏。这说明纸写物被广泛应用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。文书所志，大自官府典章制度，经史撰述，小到私人日常生活琐记。文别除汉文外，还有古维吾尔文、藏文、察合台文、西夏文、于阗文、龟兹文、蒙文及其它文字。真可谓数量众多，种类繁多。这些文物发现不正是当年纸写物的一个缩影吗！相反，这个时期的简牍文书，即使在遥远的新疆地区也很少发现。晋亡后纸代替了简牍是无可置疑的。

隋唐政权的建立，结束了魏晋以来长期动乱的局面。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，保障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科学文化事业也出现了更加繁荣的新景象。唐代是纸写书的极盛时期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。由于本文旨在探索纸写书的起源和以纸替代简帛的过程，因此关于唐代和以后情况就省笔不再赘述了。

